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编写的《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对党史上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读,是一部学习党史的生动教材。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于什么时候?通常都会说是1921年7月23日,这是中共一大召开的日子。但是,中共一大在权威的党史著作中被表述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前已经成立了,“否则各地无法推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这从常理判断也是对的,即先有了党,才能产生出代表去召开代表大会,只是这个已经成立的党在中共历史话语体系里被称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这个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组织”。他们还在11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于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创刊了《共产党》月刊。李大钊应邀在10月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同年底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毛泽东1921年1月写给蔡和森的信表明他了解并赞同上海方面建党的动向,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后至中共一大召开,李汉俊“在上海代理共产党书记”,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发动尽力独多”。李达也说,“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是“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经过这样一番发动之后,各地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有了五十多名党员,这才能选出代表参加党的一大。

从中央苏区长征的是哪支红军?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从粤都河以北地区出发,开始长征。这里应该明确的是,红军这时的番号是“中央红军”,而不是“红一方面军”,虽然这是同一支部队,但番号变换了好几次。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1931年11月,改称中央红军;1932年6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4年1月,再次改称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8月再次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为贯彻北上方针,率红一、

有多少你不了解的党史知识

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月初,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甘泉地区同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下辖的第一一五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第一二〇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第一二九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八路军”原是粤军番号,1936年7月“两广兵变”失败后被撤销建制;以上三个师的番号,则是东北军缩编时被取消的番号。这些国民党军弃用的旧番号,一旦注入了红军的热血,顿时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光辉名字。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什么?

面对国内外敌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只用三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什么呢?本书认为“根本因素还是民心的向背”。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统一规定,重新颁布”,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这一闻名遐迩的铁的纪律,一直是我党我军取得民心、战胜敌人的法宝。

早在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次年1月又宣布了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上述军纪的执行情况。4月3日,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开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其中仅“还门板”改为“上开门板”一字之改,就能看到我党我军对群众利益的关注。

根据《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年7月—1930年4月)》的记载,“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已经具体规定到细节,比如将“一点东西”规定到“一根草也是一点”,比如“损坏东西要赔”规定到损坏了“任何不值钱的东西”也要赔的程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始终如一。

阅读《中共党史知识问答》,能够在了解百年党史的同时,真正懂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内涵。 □马长虹

毛泽东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生前大力倡导,并终身躬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这里说的调查研究,不是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工厂、学校,深入街道、社区去调查研究,而是要多读书,广读书,在史籍学海中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过程中,对书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记载、纪事、纪实、评论、评说、评价等,习惯把载有与此相同内容的书都找出来,一种一种地读。前人写的,后人写的;前人的注释、评论,后人的考证、评说,等等,相关的书都找来读。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用唯物论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去研究。这是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等史籍过程中一直坚持的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也是毛泽东一直践行到晚年的一种读书习惯。在书山学海中“调查研究”,这种读史、学史方法是毛泽东独特之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做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

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就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问题,毛泽东举出了如下的理由和例证,加以说明。毛泽东对担任他古籍助读工作的北大中文系芦荻老师说:一部二十四史,写祥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承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摆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认为,洋洋4000多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毛泽东这样说,是在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也就是在读了全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各朝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后得出来的一个重要结论。他说过: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除了读这些大部头的史籍之外,他还读了大量的稗官野史、各种历史通俗演义、笔记小说、札记、随笔等才形成了这样独特的看法。毛泽东在书籍、知识的海洋里调查研究很广泛、很勤奋、很下功夫,几十年里,他一直这样做。

毛泽东说: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他认为,书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判断和推理,就会尊重历史、维护历史,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徐中远

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中央决定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直接以党性命名的中央文件。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形势发生复杂变化,党和军队中也出现了非常危险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有的根据地出现了各自为政甚至对抗中央的问题;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及其他反动势力采取多种方法分裂、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中共中央认识到,如果不及纠正这些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必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使党和革命受到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如何增强全党对党性的认识问题展开专题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件)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他进一步提出了:“我党干部要做到虽

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这个决定于7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决定》列举了违反党性的表现,如政治上自由行动、独断专行、阳奉阴违、对党隐瞒等,组织上反对集中领导、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自成局面等,思想意识上不密切联系群众、个人利益高于一切、风头主义等问题和错误倾向。《决定》分析了产生违反党性倾向的原因,如长期的农村革命环境、游击战争的分散和独立活动、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环境下党员成分的复杂等。《决定》提出了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增强党性的一系列原则要求和具体措施,包括加强中央领导、勇于自我批评、加强学习、强化党的纪律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

《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更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明确提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的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个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决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性和勇于自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部分)。

我革命的勇气。《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明确了党性的概念、内涵和增强党性的方法,从而引起了全党对党性问题的重视和深入思考,增强了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意识,端正了党员干部的政治态度,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对抗战时期党的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此后,党性概念开始更加广泛地进入了党的建设领域,党性要求成为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决定》也成为此后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文件之一。 □张莹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中共西安市委 宣传部 中共西安市委 文明办 监制